

阡陌百独舞

叶敬忠 吴惠芳 /著

中国农村留守妇女



Dancing Solo : Women Left Behind in Rural China

自20世纪90年代，大量农村已婚男性劳动力外出到城市务工，农村留守妇女现象随之出现。丈夫外出务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改善了家庭生活，但因为丈夫在家庭中的缺席，留守妇女独自承担起了农业生产、子女抚养、老人赡养等家庭责任，因而面临劳动负担和心理负担同时加重的困境。此外，夫妻长期的空间分离不仅使婚姻的许多功能无法得以实现，也使他们的婚姻稳定面临诸多挑战。

阡陌独舞

中国农村留守妇女

叶敬忠 吴惠芳 /著

· 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系列 ·

阡陌独舞

——中国农村留守妇女

著 者 / 叶敬忠 吴惠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孙以年

责任校对 / 孙 鹏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9.25

字 数 / 500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276 - 5/D · 0114

定 价 / 5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其中大量的农村已婚男性劳动力外出到城市务工，农村留守妇女现象随之开始出现。学术界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和影响的研究，后来关注农民工在城市的各种权利、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问题，仅在最近两年，留守妇女问题才引起一些关注，这比留守妇女现象出现的时间滞后了近 20 年。

我们对留守妇女问题的关注始于 2004~2005 年开展的“关注留守儿童”的研究。在该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留守儿童属于单亲监护类型，即父亲外出务工、母亲留守在家照顾儿童的情况。在探讨留守儿童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他们的母亲——留守妇女所承受的繁重的劳动负担和沉重的心理负担，这引起了我们对留守妇女的关注。从那时开始，我们一直关注媒体和学术界关于留守妇女的讨论和研究。自 2006 年 11 月，我们组成“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课题组，并开始对农村留守妇女展开全面的研究。

本研究在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输出最为集中的五个省份，即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和四川省，各选择了 1 个县，每个县选取 2 个乡镇（镇），每个乡（镇）选取 1 个行政村，共计 10 个行政村作为研究社区。实地调研采用了问卷、个案深度访谈、半结构访谈、小组访谈法，完成了每个调查地点的社区概况、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的问卷与案例、留守妇女不同相关群体的小组访谈以及县、村干部访谈等，获得了丰富的一手数据和资料。另外，研究还设计了对北京市的务工人员的调查，以考察外出务工丈夫视角的留守妇女问题。

本书所呈现的是该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 6 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介绍，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过程以及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的现状以及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的影响，从人口学特征、其他基本特征、家庭经济、农业生产、家庭关系与社会网络、心理感受、闲暇娱乐与自我发展几个方面全面展示了留守妇女的生活；第三部分是留守妇女的应对策略和社会支持，分别从留守妇女自



身能动地应对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难以及外部对留守妇女的支持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四部分是留守妇女的多元性分析，从地区、年龄、文化程度、留守年限、务工经历、丈夫务工情况、分家及居住状况七个维度论述了留守妇女群体内部的异质性；第五部分从不同角色的视角对留守妇女问题进行了审视，包括外出务工丈夫、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非留守妇女及其他角色；第六部分是专题讨论，对实地研究过程中发现的一些与留守妇女相关的议题进行了思考和分析。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课题组成员历时一年半的集体研究成果。在前期研究设计阶段，课题组成员连续两个月讨论和修改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等设计方案。实地调查中我们始终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与农民朋友的同吃同住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观察、体验和感悟留守妇女的生活现实。在承担着巨大的调查研究任务的同时，课题组成员再一次经历了农村生活的经验与磨炼。试调查期间，课题组有的成员不适应当地饮食而闹起了胃病，有的被蚊虫叮咬得满身是包、瘙痒难耐；正式调查期间，调查地区都处于炎热的农忙季节，留守妇女白天都在田间忙碌，课题组成员或中午顶着暴晒的烈日或起早贪黑到家中找人，很多时候则是蹲在田间地头或与她们共同劳动中与她们进行交流。实地调研结束后，课题组立即开始了问卷整理核对、录入、数据输出、讨论研究发现、数据分析、报告撰写及讨论与修改工作，在此过程中，课题组成员有争论、有冲突，但最终使得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更加清晰、更加深入，并实现了达成共识的过程。正是课题组所有成员夜以继日的辛劳才使得我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及时出版，在此对课题组所有成员的工作表示感谢！

我们希望本书可以全面、深入地展示留守妇女的生活世界，并借此引起社会各界对留守妇女问题的关注和关心。本研究在揭示农村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影响的同时，也对相关的社会政策与可能的干预行动提出了建议。希望本书可以为从事农村留守人口研究、农村发展与妇女研究的机构和个人提供第一手资料和学术参考；为农村妇女工作者尤其是各级妇联组织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妇女工作实践者提供一定的借鉴；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制定应对留守妇女问题政策的依据。本研究肯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将继续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

“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由叶敬忠教授主持，参加人员包括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教授、副教授以及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们是吴惠芳、王伊欢、张克云、杨照、饶静、黄颖、刘娟、辛允星、刘鹏、张亚鹃、潘璐、贺聪志、李春艳、那鲲鹏、安苗、赵勇、赵康、王奕、范旸、

孟祥丹、陈世栋、田坤、呼占平、梁振华、刘剑鹏、李伟军。

本研究得到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6-0118）、中国农业大学“985工程”中国农村政策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以及德国EED基金会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在调查过程中大力支持和配合我们的省、县、乡、村各级的干部，尤其是不分白天黑夜、雨天晴天，带领我们走乡串户访问农民的村干部们，也深深感谢尽己所能为我们提供饮食住宿条件的所有农户！

我们真诚感谢接受我们调查的留守妇女、非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外出务工人员、地方干部和村民！尤其要特别感谢和我们真诚面对的留守妇女！在访谈过程中，我们无数次面对留守妇女谈到其留守生活时无法抑制的眼泪，我们的交流是为了了解更多的信息，却因此触动了她们生活的痛处，为此我们感到深深的内疚。她们在巨大的劳动负担和心理压力下，为了家庭的生计独自忙碌且能积极应对多种困难与挑战，在此，我们也向她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独自在农村承担起家庭的各种责任，因而背负着劳动的艰辛、心理的沉重和生活的无奈，但她们能以积极的能动性采取各种策略和行动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与问题，坚强地支撑着留守的家庭。本书正是希望以《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这一书名来描绘和概括留守妇女的这种生活特征和生活精神。

叶敬忠

2008年5月于北京

目 录

导 言	001
-----------	-----

第一部分 研究介绍

1. 研究设计	021
2. 文献综述	045

第二部分 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的 现状与所受影响

3. 留守妇女的人口学特征	061
4. 留守妇女家庭的经济、生产与决策	076
5. 留守妇女的夫妻关系	102
6. 留守妇女的家庭关系与社会网络	121
7. 留守妇女的心理感受	142
8. 留守妇女的闲暇娱乐与自我发展	164

第三部分 留守妇女的应对策略与社会支持

9. 留守妇女的应对策略	175
10. 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	210

第四部分 留守妇女群体的多元性

11. 不同地区留守妇女的差异	223
-----------------------	-----

12. 不同年龄段留守妇女的差异	236
13. 不同文化程度留守妇女的差异	246
14. 不同留守年限留守妇女的差异	250
15. 有无外出务工经历留守妇女的差异	254
16. 丈夫不同务工情况留守妇女的差异	259
17. 不同分家及居住状况留守妇女的差异	272

第五部分 不同角色视角的留守妇女

18. 外出务工丈夫视角的留守妇女	283
19. 留守儿童视角的留守妇女	302
20. 留守老人视角的留守妇女	311
21. 非留守妇女视角的留守妇女	319
22. 其他角色视角的留守妇女	326

第六部分 专题讨论

23. 全球化技术与留守妇女	337
24. 礼物：在留守妇女和丈夫之间	346
25. 留守妇女与宗教信仰	353
26. 留守妇女与新农村建设	361
27. 哺乳期留守妇女	370
28. 跨地区婚姻中的留守妇女	377
29. “破烂王”的留守妻子	383
30. 留守妇女的互助与合作	390
31. 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的“围城心理”	400
32. 农村三大留守群体相依为命	408
附录	417
参考文献	453

导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农村独特的“留守人口群体”——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就已经开始出现。在这三个留守人口群体中，留守妇女负担最重、对农村发展影响最大、但受到的关注却最少。目前已有一些关于留守妇女的研究普遍认为，丈夫外出务工给留守妇女生活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尚缺少全面和系统的研究。自 2006 年 11 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开展了“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留守妇女的生活，从多维度和多视角来揭示留守妇女的现状、能动性、应对策略和社会支持，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留守妇女问题的建议。导言部分是对本研究主要内容和成果的摘要。

一 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的现状与所受影响

（一）留守妇女的人口学特征

在被调查留守妇女中，年龄分布于 36~45 岁之间的超过半数，26~35 岁的比例为 29.0%，婚龄分布集中于 6~25 年之间。留守妇女接受小学教育的最多，其次是初中，文盲占总数的 23.0%。但是，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段留守妇女的文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生育率方面，留守妇女生育 2 个孩子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生育 1 个孩子，不同地区留守妇女的生育率有所不同。哺乳期留守妇女是留守妇女中一个特殊的亚群体。大部分留守妇女养育着 1 个或 2 个留守儿童。

丈夫外出、妻子留守，是家庭的理性决策结果。丈夫外出务工的原因复杂多样，经济原因主要是为了家庭生计，包括解决家庭入不敷出的局面、修房建屋、子女教育或结婚、还债或还贷款等；社会原因包括农村传统性别分工观念、社区务工潮流及其他原因（如出去见世面）等。妇女留守的原因主要包括孩子学习辅导和生活照料需要；农业生产需要；照顾老人需要；自身能力限制无法外出等。



被调查留守妇女的丈夫与同乡结伴外出的比例最高，每年外出务工的时间以9~12个月为主，务工地点以外省（市）为主，务工行业主要有建筑业、加工制造业、商贸流通业和服务业等。近半数留守妇女的丈夫每年只回家一次。半数以上留守妇女的丈夫在外务工时间超过10年。

近1/3的留守妇女身体状况较差，常年劳累、缺乏营养造成的疾病和妇科疾病是她们的常见疾病。她们仍以农业生产为主，近半数留守妇女曾经外出务工。与公婆分家的留守妇女比例大大高于未分家的比例，结婚未满5年、独生子女家庭的留守妇女大多未与公婆分家。分家与否是影响留守妇女与公婆共同居住的重要因素，总的看来，留守妇女与子女同住的情况最多。

（二）留守妇女家庭的经济、生产与决策

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家庭的经济贡献较高，主要体现为提高家庭日常生活水平、解决子女教育费用问题、解决医疗费用问题、改善家庭居住环境等方面。留守妇女家庭的三项主要支出是孩子上学花费、日常生活开支、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投入。子女教育仍是留守妇女家庭经济活动的最主要目的。留守妇女对丈夫务工收入的态度形成“不满意+没办法=满意”的模式。近九成留守妇女认为丈夫在外花销正常或比较节俭。尽管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掌管家庭财务的比例大大提高，但她们仍是家庭财务的被动掌管者，她们对家庭财务管理概念更多的诠释是“看管”而非决策。电视机、手机和固定电话是留守妇女家庭生活耐用品拥有率最高的“三大件”。在丈夫务工期间，留守妇女家庭增加最多的生活耐用品是手机和固定电话。

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成为家庭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劳动力不足、没有掌握技术、生产资料购买困难等是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主要问题。留守妇女通过两种方式应对这些问题：一种是减少耕种土地的面积；另一种是调整农业生产的类别。家庭农业生产劳动分工由于丈夫外出务工而发生了较大的调整，由丈夫主要承担转变为留守妇女主要承担，这充分说明了劳动力外出务工所带来的农业生产女性化趋势；对于家务劳动，留守妇女仍是主要承担者，但丈夫的辅助作用降低甚至完全没有。无论是生产劳动还是家庭劳动，留守妇女承担的比例都在85.0%以上，占了绝大多数，这充分说明了留守妇女沉重的劳动负担状况。劳动分工的变化还充分说明，因为丈夫外出务工，农村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劳动分工模式被打破。

丈夫外出务工增加了留守妇女代表家庭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使她们在社区公共事务方面的参与程度得到提高。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决策变得比丈夫更重要。丈夫虽然不在家，但在家庭重大事项的决策上仍然处于核心决策地位。从总体看，留守妇女的家庭决策地位得到了提高，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留守妇女的负担和压力，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留守妇女在家庭管理中的地位，增强了她们的家庭管理和经营的能力。

（三）留守妇女的夫妻关系

丈夫在外务工期间，留守妇女和丈夫的主要情感交流工具是电话，大部分留守妇女与丈夫联系的频率集中在一周左右，大部分留守妇女与丈夫每次的通话时间在 10 分钟左右。但也有 7.0% 的留守妇女与丈夫每隔一个月以上才联系一次；两成以上的留守妇女与丈夫每次的通话时间不足 3 分钟，或不通电话。电话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夫妻分离的距离感，然而，这样的沟通和互动频率远远不能满足留守妇女和丈夫的情感需求。留守妇女在与丈夫通话时，谈论较多的是关于孩子的情况、相互的关怀与叮嘱以及家庭生产情况。

59.0% 的留守妇女表示很了解丈夫的心事，17.3% 的留守妇女认为自己不了解丈夫的心事。夫妻之间的相互了解程度是相互对应的，即在丈夫很了解妻子心事的夫妻中，妻子很了解丈夫的比例最高。54.3% 的留守妇女表示会把自己的烦恼与心事主动告诉丈夫，由于顾忌到丈夫在外务工的心情和安全，留守妇女一般会有选择地向丈夫倾诉自己的苦恼与心事。另外，68.6% 的留守妇女会主动询问丈夫的苦恼与心事，31.4% 的留守妇女不会主动询问。

丈夫外出务工对夫妻关系正面影响多于负面影响。大部分留守妇女认为她们的夫妻关系在丈夫务工后没有变化，而在夫妻关系有变化的样本中，夫妻关系变得更好的居多。在可能影响夫妻关系的因素中，留守妇女首选的三个影响因素分别是第三者插足、丈夫不管家、丈夫跟自己的思想观念不一致。在丈夫外出务工期间，8.3% 的留守妇女和丈夫出现过感情危机，虽然这一比例并不高，但反映出两地分居对夫妻关系带来的潜在影响和威胁。留守妇女对丈夫的信任程度较高，相对于收入、出轨等方面，她们最担心的是丈夫的安全和身体健康。养家糊口是留守妇女对丈夫最大的期望，除此之外，注意安全、多关心家人、戒掉不良习惯等也是部分留守妇女对丈夫的期望。



（四）留守妇女的家庭关系与社会网络

大部分留守妇女认为丈夫长期外出务工并没有导致子女普遍“更不听话”的现象。留守妇女在子女抚育方面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没有能力辅导子女学习、管不住子女、没有人帮忙照顾子女及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子女。丈夫外出务工对子女的学习辅导和监督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留守妇女管教子女的方式主要是讲道理、训斥和体罚。“打骂”对儿童来说是一种身体虐待和语言虐待，会使儿童遭受很大的心理伤害，对子女健康的人格塑造极为不利。

留守妇女由于劳动负担和精神负担都很沉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们与子女的沟通。留守妇女担心子女成长中的问题主要有学习问题、身体健康与安全问题、道德与人际交往问题。留守妇女家庭对于子女的期望是“多读书”，而不是“早挣钱”。虽然留守妇女普遍重视子女的学习问题，但她们与学校老师的联系频率并不高。

留守妇女与公公婆婆之间关系大部分融洽或一般，有时会有矛盾。他们之间在经济方面既相互独立但又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来往。未分家和与公公婆婆同住的留守妇女与公公婆婆的关系的融洽程度高于分家和不与公公婆婆同住的留守妇女，前者在劳动上获得的帮扶高于后者，前者心理上的不良情绪也低于后者。公公婆婆的帮扶对于减轻留守妇女的劳动负担和减缓留守妇女的心理压力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总体上看，丈夫外出务工对于留守妇女与公公婆婆以及其他婆家人关系的融洽程度影响较小，但留守妇女大多认为丈夫外出务工后与公公婆婆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

丈夫外出务工期间，留守妇女与公公婆婆以及婆家人产生矛盾时，主要是通过自己来处理（双方协商解决或者自然化解），对社会网络的使用较少；在遇到与社区成员的纠纷时，血缘和姻缘网络对于维护留守妇女的权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村干部对于血缘和姻缘网络薄弱的留守妇女在解决与他人的纠纷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遇到困难时，血缘和姻缘网络是留守妇女寻求支持和帮助的首选，地缘网络居其次，其他正式网络往往是留守妇女求助的最后选择，村干部并没有在留守妇女遇到困难时起到作用；在情感交流方面，地缘和业缘网络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血缘和姻缘网络次之。

（五）留守妇女的心理感受

留守妇女感受到的生活压力大于非留守妇女，其中 36~45 岁的留守

妇女感受到的生活压力最大，家庭经济、家庭责任和农业生产方面的压力最大。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哭泣的情况明显增加，留守妇女在感到独自一人很难承担农业生产的重担、因为要兼顾农业生产和照顾孩子以及家务而感到力不从心、遇到家庭经济困境或紧急情况自己无法解决、担心在外务工的丈夫、自己在家里受到委屈或欺负等情况下，会用眼泪表达内心之苦。然而，留守妇女并不愿意让丈夫知道自己的痛苦，更不愿意丈夫为此担心。

留守妇女的安全感较低，盗窃、恶劣天气、老人身体生病、孩子哭闹（怕孩子生病）等紧急事件都足以使她们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因此，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遭遇的不安全情况有了明显的增加。子女的陪伴、公婆的陪伴、良好的邻里关系和社区环境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留守妇女的安全感。丈夫外出务工导致留守妇女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遇到纠纷时，留守妇女更容易成为被人欺负的对象。被同社区男性骚扰对留守妇女的安全感和婚姻构成威胁。留守妇女在生活中的不良情绪较多，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她们的孤单感。同时，由于留守妇女和丈夫分居两地，婚姻所承担的性需求满足功能基本无法实现，因而对婚姻关系也构成了一定的潜在威胁。烦躁情绪在留守妇女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频率也较高，少数留守妇女甚至出现极端不良情绪。留守妇女信仰宗教的情况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安全感低、遇到无法解释的意外情况、患病、被宗教教义吸引以及家庭因素是留守妇女信仰宗教的主要原因；而宗教信仰一方面对于留守妇女在不良情绪的宣泄和心灵的慰藉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则为她们构建了一个寻求支持和帮助的平台。

半数以上的留守妇女想和丈夫一起外出务工，但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留守妇女已经打算和丈夫共同外出务工，大部分人因为经济原因仍希望丈夫继续在外务工而自己留守在家照顾家庭。可以预见，农村留守妇女的留守状态在一定时期内将会持续下去。

（六）留守妇女的闲暇娱乐与自我发展

丈夫外出务工使得留守妇女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生产和家务劳动，从而导致其闲暇时间的减少。留守妇女的闲暇娱乐活动以看电视、聊天串门或走亲戚为主，其次为赶集、打麻将和打牌。电视是留守妇女了解各种信息的最主要渠道；串门对留守妇女还有一层新的意义，即它是留守妇女解决不良情绪的主要方法之一。农村文艺设施和活动的匮乏造成了农村妇女文艺活动的缺乏。

留守妇女关心的信息面广泛，最关心的是子女教育信息；受丈夫在外务工的影响，她们更关心农民工权益保障信息。留守妇女参加技术培训的愿望强烈，对种植业技术、养殖业技术和卫生保健知识培训的需求相对较高。此外，她们对务工技术培训也有一定程度的需求，反映出她们对于外出务工或从事非农职业的需求。然而，大部分留守妇女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半数以上的留守妇女有参加组织或协会的愿望，她们对生产服务型组织的需求比较强烈，其次是文艺协会或组织。

二 留守妇女的应对策略与社会支持

（一）留守妇女的应对策略

留守妇女主要应用成本收益分析和户内风险均衡机制来决定家庭生产结构和农事活动。留守妇女的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等劳动负担大都自己一个人承担，公公婆婆和亲戚偶尔会帮忙。留守妇女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自己做，无法自己做的就找人帮工或换工，找不到人帮忙就雇工解决。无论帮工、换工还是雇工，留守妇女一般找女性劳动力帮忙。遇到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困难时，留守妇女通过咨询本村的农业生产能手、向种子化肥农药等销售部门获取农业生产的技术和信息、参加“公司+农户”组织、聊天交流农业生产的经验、自己看书和相关媒体等途径进行学习。

在家庭财务管理方面，丈夫不在家时遇到大笔的花销，留守妇女需要和丈夫电话商量。留守妇女以“把钱花在最重要的地方，能省则省”作为自己的理财策略，采取各种方式以节省家庭开支。当家庭缺钱时，留守妇女会通过借钱、让丈夫寄钱回来、到信用社贷款、赊账等方式应对。

留守妇女信任和体谅丈夫以维系夫妻感情。留守妇女家庭通过电话或手机来保证与丈夫的及时交流，在通话时，“好事多说，不好的事少说”是留守妇女避免丈夫操心的策略。夫妻感情好且丈夫收入较高的留守妇女会和孩子一起到丈夫务工地生活一段时间。留守妇女常会以玩笑的形式叮嘱和告诫丈夫不要在外面感情出轨。面对丈夫的感情出轨，留守妇女采取“以实际行动感动丈夫”、“好言相劝”、“以孩子为重”、“顾及脸面”等策略首先原谅丈夫，然后争取丈夫回心转意；对于不顾及夫妻感情和子女养育的丈夫，有的留守妇女也选择了默默地忍受和牺牲。

留守妇女通过言传身教鼓励子女用功读书，她们通常以其亲身经历和体验为例来说明读书的好处。此外，丈夫会通过电话教育孩子，有些留守



妇女也会通过各种方式与老师联系以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和日常表现。部分留守妇女教育子女的方式简单粗暴，常采取训斥、体罚等方式，但仍存在管不住孩子的问题。

面对窘境，留守妇女会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尊重。她们通常依靠自己或亲人来进行抗争。此外，留守妇女还会与亲戚临时住在一起，或加固居住环境来保证家庭成员和家庭财产的安全。当矛盾、骚扰等不断升级时，留守妇女会通过村委会甚至公安部门等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留守妇女缺乏保健意识，更缺乏家庭与社会的支持，尤其是年龄大的留守妇女，小病拖成慢性病、大病，最后发展到很难医治。有些留守妇女甚至只能通过信神或信教来缓解病痛感，她们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

留守妇女应对自身不良情绪的策略有多种，在处理邻里关系、婆媳关系和夫妻关系时多会体谅与忍让；心情不好的时候，通过看电视、给丈夫打电话、串门、打牌、聊天、哭泣等来平复她们的心情；有些地区的留守妇女通过信仰宗教来缓解不良情绪。

（二）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

目前针对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多属于非正式的社会支持，集中在家庭和邻里、亲戚、朋友之间。以社区、政府和社会名义专门针对留守妇女的正式社会支持几乎没有。

留守妇女通过家庭网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要包括：经济支持、生活支持、安全保障、感情交流和应对紧急事件时的支持。其中，丈夫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经济收入、情感上的安慰和决策时的协商、农忙时的帮助、辅助性社会网络来源和心理上的安全感等方面。子女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减轻留守妇女的劳动负担、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以及对母亲的理解和回报等。除了家庭网之外，社区层面对留守妇女的支持包括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邻里互助、与社区成员的情感与信息交流以及纠纷的解决等。

在留守妇女生活的社区，可以成立留守妇女互助小组；留守妇女之间可以自发组织文化文艺协会，社区可为其提供活动的场所；帮助留守儿童，减少留守妇女的后顾之忧；在社区层面开展各种培训；有条件的社区组织治安联防队。

中央政府和县乡两级地方政府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中央政府应该主要负责资金支持和政策法律支持，而地方政府应在实践层面上开展多种活动来帮助留守妇女。具体建议包括：建立留守妇女权益维护网络；建立留守妇女健康保障体系；促进留守妇女的自身发展；国家应改善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从而改善留守妇女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扶持地方工业和企业的发展；优化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环境和权益保障。

在社会服务方面，主要应该加强农村金融、邮政储蓄服务和农村医疗服务的建设，为留守妇女及其家庭提供支持。另外，农民工用工单位和各类妇女非政府组织也可以为留守妇女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支持。

三 留守妇女群体的多元性

（一）不同地区留守妇女的差异

安徽省外出丈夫的收入水平高于其他四个省，四川省外出丈夫的收入水平最低。安徽省留守妇女对丈夫收入的满意度最高，湖南省和河南省留守妇女的满意程度则明显偏低。湖南省留守妇女家庭最大的支出是人情往来，安徽、河南、湖南三省留守妇女家庭最大支出项目是子女教育，而四川省留守妇子女教育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当出现现金短缺时，安徽省留守妇女采取借钱策略的比例最高，湖南省留守妇女让丈夫寄钱回来的比例最高，江西省留守妇女选择贷款的比例最高。

四川省留守妇女的耕地面积调整得最少，河南省和安徽省留守妇女增加耕地面积的情况较多，湖南省和江西省留守妇女减少耕种面积的情况则较多。农忙时节面对劳动力的缺乏，安徽外出务工丈夫回乡帮忙的情况最多；四川省留守妇女获得公婆或父母、亲戚、朋友的帮助最多，安徽省留守妇女雇工的比例最高。

安徽省留守妇女家庭的固定电话普及率最高，外出丈夫主动联系留守妻子的比例最高。湖南省留守妇女使用手机短信和丈夫联系的比例最多，她们每天和丈夫联系的情况也最多。河南省留守妇女家庭的电话普及率较低，联系频率也相对较低。相对来说，安徽省和江西省留守妇女的安全感较低，而湖南省和四川省留守妇女的安全感较高。

湖南省和四川省留守妇女的闲暇方式以打牌、打麻将的情况最多；而四川省近六成的留守妇女将赶集作为闲暇活动。四川省留守妇女对养殖技术培训需求最高，安徽省留守妇女对种植技术、法律知识、务工技术和卫生保健知识的培训都最突出，而河南省留守妇女对培训的兴趣相对较低。

（二）不同年龄段留守妇女的差异

年龄越大的留守妇女务农的比例越高，对丈夫务工收入的满意程度也



较高；年龄越小的留守妇女只做家务的比例越高。在 45 岁以下的留守妇女中，年龄越大的人在农业生产中越多地遇到生产资料购买困难和劳动力不足问题，获得公婆或父母的帮忙越少，但获得丈夫、子女和邻居的帮忙越多；而 46 岁及以上留守妇女获得子女帮助较少，获得邻居帮忙的比例下降。

留守妇女年龄越小，使用手机的情况越多，与丈夫的联系频率也较高，且通话时间较长，更多地和丈夫相互倾诉苦恼和心事。中青年留守妇女在和丈夫联系时子女情况是主题，年纪较大的留守妇女和丈夫相互间关怀和叮嘱增加。年轻的留守妇女更多地主动把心事告诉丈夫且询问丈夫的苦恼和心事，更多担心丈夫感情出轨，她们认为丈夫外出务工对夫妻关系的负面影响较大。年轻留守妇女在子女抚育方面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没人帮忙照顾子女，而年长一些的留守妇女在辅导子女学习上困难较多。

31~45 岁这一年龄段的留守妇女的生活压力感受最为明显，这一年龄段的留守妇女经常或有时哭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留守妇女。在不良情绪方面，25 岁及以下和 46 岁及以上的留守妇女在各种不良情绪方面（孤单、害怕、情绪低落、烦躁、焦虑、压抑）的比例均低于其他年龄段。年轻留守妇女的闲暇娱乐方式更加多样化，对协会和组织的需求和关注度较高。25 岁以下的留守妇女参加培训的经历最多，对农民工权益保障信息的关注较多，但她们对农业技术信息、农产品销售信息和农村农业政策信息的关心程度较低。

（三）不同文化程度留守妇女的差异

文化程度越高的留守妇女通过手机短信与丈夫联系的情况越多。文化程度较高的留守妇女对丈夫收入的满意度较低。文化程度越高的留守妇女与子女谈心事的情况越多，与老师联系更为积极。对于子女犯错后的管教方式，文盲和小学文化的留守妇女采取训斥和体罚方式居多。文化程度越低的留守妇女更多地面临没有能力辅导子女学习的困难。

家庭决策方面，关于子女教育和房屋建设的决策，随着留守妇女文化程度的提高，夫妻共同做主的情况增多，同时留守妇女参与决策的比例也增加。家庭大件物品购买上，文化程度较高的留守妇女其决策地位明显较高。

文化程度越高的留守妇女选择读书看报的闲暇方式的比例越高。文化程度越低的留守妇女，参加协会或组织的意愿越低。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留守妇女对各方面信息的关注度也逐渐增加，对培训的需求越高。